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AYYID AJALL OMER SHAMS AL-D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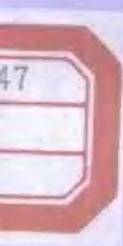
赛典赤·赡思丁评传

李清升 著

By Li Qing Sheng



忧国爱民 文德武功
生死两个谜
四个云南历史第一
两个中国历史第一



云南民族出版社

Yunnan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赛典赤·赡思丁评传

李清升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纳文汇

装帧设计 蒋高仪

责任校对 陈江涛

赛典赤·赡思丁评传

李清升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复制工程队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0 千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7-1641-9

K·362

定价：16.00 元

頌穆斯林先哲功勳

立多民族團結碑

劉樹生
五月

苗族開發雲南
業績非凡
名垂青史

為沈升月、李秋著，雲南民族出版社
一書出版中題

戊寅年春 趙達完

弘揚民族精神為
建設社會主義服務

馬有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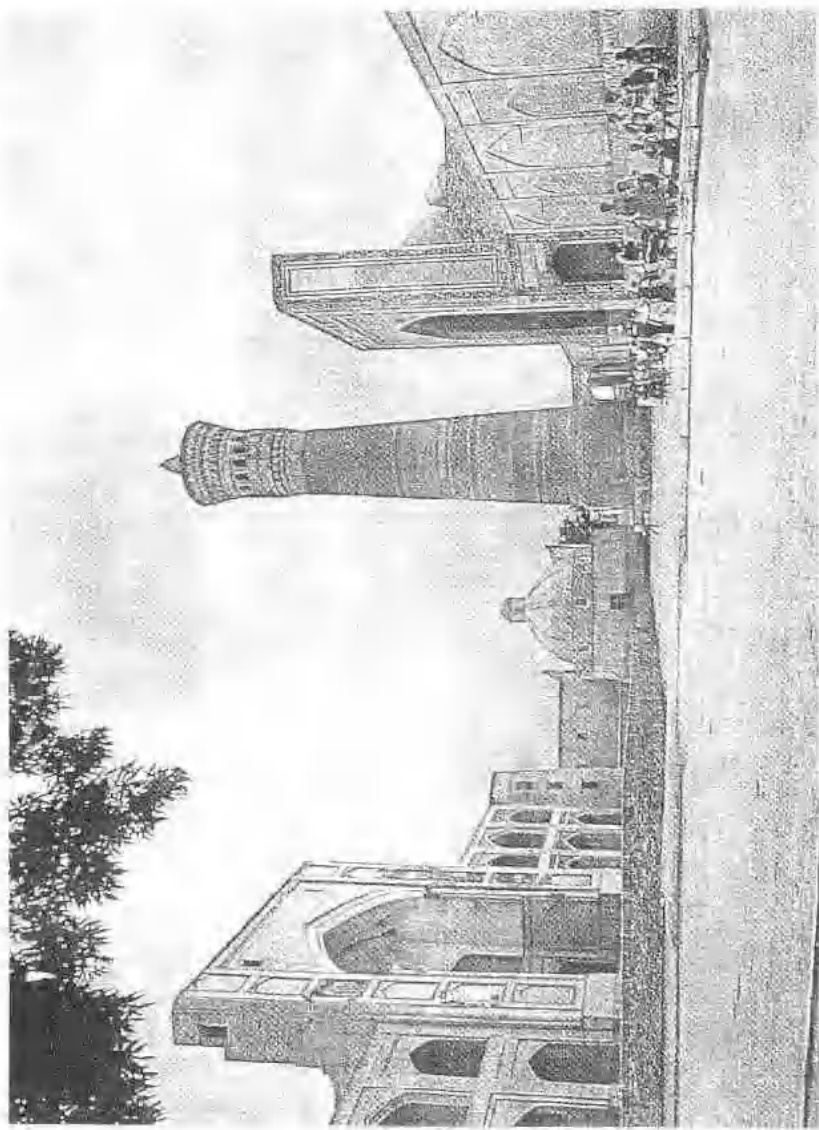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

功在当代

泽及后世

楊兆鈞題



察典赤·瞻思丁故乡——布哈拉古城（蒋敬提供）

赛典亦任云南平章政事时兴建的松华坝
水库远景（马颖生摄）



赛典亦时兴建，至今仍发挥作用的
金汁河（马颖生摄）



赛典亦时兴建的位于松华坝上坝村，
横跨盘龙江上游两岸，起分流作用的
龙川桥（马颖生摄）



赛典赤时兴建、后世重修的银汁河（李捷摄）



赛典赤部属张立道兴建、后世重修的海口石闸



赛典赤时疏浚拓宽的滇池出水口——海口（马颖生摄）



赛典赤时修筑的通京古驿道上的放
马桥（李捷摄）



位于松华坝的赛典赤墓（马颖生摄）



昆明五里多赛典赤墓（马颖生摄）



序（一）

王連芳

两年前，我曾为纳为信同志所著的《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作过序。在那篇短文中，我既肯定了赛典赤先哲，也肯定了为信同志本人。现在，案头又摆着回族学者李清升同志新著的《赛典赤·赡思丁评传》。这两位同志我都很熟悉，为他们的著作作序都感到很高兴，故欣然命笔。之所以如此：一、两人尽管写的是同一位先哲，但各有侧重，使人并无重复之感，而是相辅相成，各有自己独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二、两人的年龄、经历、学历很不相同。一位是民族工作老战士、回族作家，一位是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回族中年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在撰写这两部力著时，不仅没有囿于中外已有的文献史籍，而是都到赛典赤当年任职的省区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对纳为信本人，我在序言中已作过评价，在这里，有必要着重对清升同志作一介绍。

清升同志 1982 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发表过不少获奖的散文和论文，后调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现任民族经济研究室主任。作为一位专业知识分子，从新闻系列转入社科研究，并非易事，但竟然能写出这样一部受到专家好评和肯定的力著，这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我不妨再次指出，这恐怕与他依靠书本而又超越书本，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生活有直接关系。一个学者，要真正成熟，是离不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

7253/07

作为中亚人的赛典赤·赡思丁，在归附蒙古后，用自己的才干、胆识，在中国土地特别是在云南为政6年，取得非凡业绩，最后和众多子孙落籍中国，成为人才济济的望族，其本人至今仍为各族人民所敬佩，这是很了不起的，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成功之道，确需我们后人认真研究。我个人认为，他所以能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建立如此伟业，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始终能顺从人民意愿和适应时代需要，领导和依靠各族人民，妥善处理民族关系，首次建立云南行省，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文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这充分证明，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只要真正做人民迫切需要做的好事、实事，就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当然，人无完人，赛典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应该一分为二看其主流，对先哲离开当时历史条件过分苛求或者超出实际地奉为“神人”，都是有失偏颇的。

最后，听清升同志说，《赛典赤·赡思丁评传》的出版及首发式，得到了昆明紫金化工有限公司和紫金智业经贸有限公司汉族董事长兼总经理肖子金先生的鼎力支持，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说明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支持是不应分民族的，也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将与文化、社科研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形成企业文化，这是一种新的趋势，也是企业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8年1月8日

序（二）

马耀

从公元前 109 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的 2020 年中，汉晋暨隋至唐初和元、明、清约 1000 多年为郡县制时期。公元 339 年（东晋成帝咸康五年）西爨称霸南中暨公元 746 年南诏并西爨到公元 1253 年大理国灭亡约 900 多年，为地方政权时期。一部云南历史是前后两段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和中段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交替的历史，是由一个地区的民族内部统一走向全国大统一的历史。

元代是云南由地方政权走向与中原接轨的全国大统一的最后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即从元至元十一年（公元 1274 年）到十六年（公元 1279 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在安定边疆地方、团结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治武功，不仅超越了前代封建王朝派到云南屈指可数的循吏，而且为元、明、清三朝祖国大统一的巩固和发展树立了良好的开端。

赛典赤是元初著名的回回政治家。在 1253 年蒙古平大理国到 1274 年的 20 多年中，留镇云南的兀良合台改变了忽必烈进入大理时的“止杀之令”，“三籍民户、四籍民田”，蒙古贵族掳掠奴隶，把大量土地圈成牧场，骑兵肆无忌惮践踏庄稼，激起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蒙古贵族虽然依靠大理国旧主段氏镇压了这次起义，但宗王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明争暗斗，使人民痛苦不堪，云南形势长期得不到稳定。忽必烈自己也承认，“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所以在襄阳战事一结束，继续攻灭南宋的同时，就派

出曾经初宦内蒙，尽职燕京，主政陕川，对元王朝开国作出重要贡献，以“谨厚”著称的赛典赤·赡思丁为“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并得到“兼行元帅府事”，分掌部分军权的大权。

1274年赛典赤来云南建立行省时所接下来的是上面所述的一个烂摊子。

首先，1276年他着手设立郡县，把军事统治时期的19个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置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或县令。为了照顾和平衡大理总管和蒙古贵族宗王脱忽鲁的旧势力，赛典赤承袭汉武帝设立益州郡时“因俗而治”的“初郡”政策，仍以大小农奴主和奴隶主任这些路、府、州、县的世袭长官，将其纳入郡县制的轨道。赛典赤创建的省名及部分由其改置的县名，经700多年至今沿用不变。为了摆脱农奴主旧势力的钳制，加强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赛典赤把云南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大理迁移到滇池地区的中庆（昆明），因为在滇池地区经过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斗争，摧垮了农奴主和奴隶主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势力，适宜于当时生产力的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郡县制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

其次，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首要的任务是兴修水利。当时滇池的出水口——海口淤塞，雨季水溢成灾，淹进了中庆城，大片农田被淹没。赛典赤命专管农业的官员张立道征发力役2000人，用了3年时间，疏通了海口。同时，兴建了以松华坝、金汁河、银汁河为主体的水利灌溉系统，使数十万田亩得到浇灌，经历代重修扩建，至今仍造福于人民。

第三，由赛典赤在“中庆城之北处”首建并经后世迁建、重修，至今犹存的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在中庆、大理等处设儒学提举，传播中原汉族文化，培养和任用云南少数民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行省政权机构，为后来在云南推

行科举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

赛典赤在云南推行的一系列开明政策，远远胜过其前代任何一个开明的封建政治家。

史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打通“蜀身毒道”，对益州郡采取“割齐民以附夷狄”（少数民族），不在当地“征收赋税”的调边政策（以上参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平淮书》）。但是到了武帝晚年，随着奸吏豪民进入云南，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其死后一年的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居住在洱海北部的廉头、姑缯等“昆明”各部落纷纷起来反抗西汉王朝的统治，牂牁郡的同并（今弥勒一带）、谈指（今贵州兴义一带）等24邑也相继响应。王莽夺取西汉政权后，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起，就推行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下令四夷称王者改为侯，引起滇东南的句町王反抗达3年之久。天凤元年（公元14年）滇中爨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杀了益州大尹程隆，王莽派兵20万赴滇镇压，大部分战死，使新莽政权终于被内地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所推翻。

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后来臣服东汉的王莽地方官吏文齐，先在朱提（今昭通）修筑“龙池”灌溉稻田，继为益州太守，在滇池地区造起陂池，“垦田二千余顷，率励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开造稻田，民咸利之”。文齐可算是汉代封建王朝派到云南以治绩著称的第一人，但不及赛典赤治滇政绩的广泛和深入。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立永昌郡，以郑纯为太守，“纯与哀牢入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一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很像赛典赤的轻徭薄赋，而记载简略，不得其详。又章帝元和时（公元84—87年）“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颇类似赛典赤的倡导儒学，但时代遥远，史阙有间。终东汉之世，治滇有政绩者寥寥可

数，无论其范围和规模均不能与赛典赤相比。

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方务在北”的统一战争，必先安定后方云南，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于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南征南中，采取“攻心”战略，七擒七纵孟获，“秋平四郡”，削弱了地方豪强势力，起用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收到了“夷汉初安”的效果。但由于诸葛亮年年用兵，“无岁不征”，当时滇周就攻击他对南中“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吴人张俨说他“西土苦其役调”。当时蜀国统治的云南郡太守吕凯为“叛夷所害”，就是一例，大大损害了诸葛亮所标榜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的成果（以上参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等）。这和赛典赤抚滇政策比较起来，仍然是逊色的。

像赛典赤·赡思丁对云南作出过重大贡献，人民至今受其赐的人物，长期以来，对其研究者虽然不少，而多侧重于其家世的论述，至今还没有一本从学术上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其一生业绩的传记。近年来，经云南省教委立项的课题之一的《赛典赤·赡思丁评传》，由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李清升同志承担撰写完成，经回族史专家云南大学教授杨兆钧和元史专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方龄贵、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马超群、云南史学会会长云南民族学院教授谢本书、云南民族学院副教授马兴东五位学者评审，认为：“第一，选题适当。”赛典赤“在开创行省、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选择这样的历史人物立传，很有意义”。“第二，态度认真。”“把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结合进行研究……论、史结合较好。”“第三，见解有新意。”“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如赛典赤兴修水利的具体河道、墓葬的确切地址等，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认识。”“第四，行文通顺，逻辑性强，结构完整，叙述和分析能够自圆其说。”这些鉴定意见都很恰当。作者将传记的主人公置于元初实现了幅员广阔的国家大统一的背景下，依次叙述其任职各地尤其